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紀念胡適之先生 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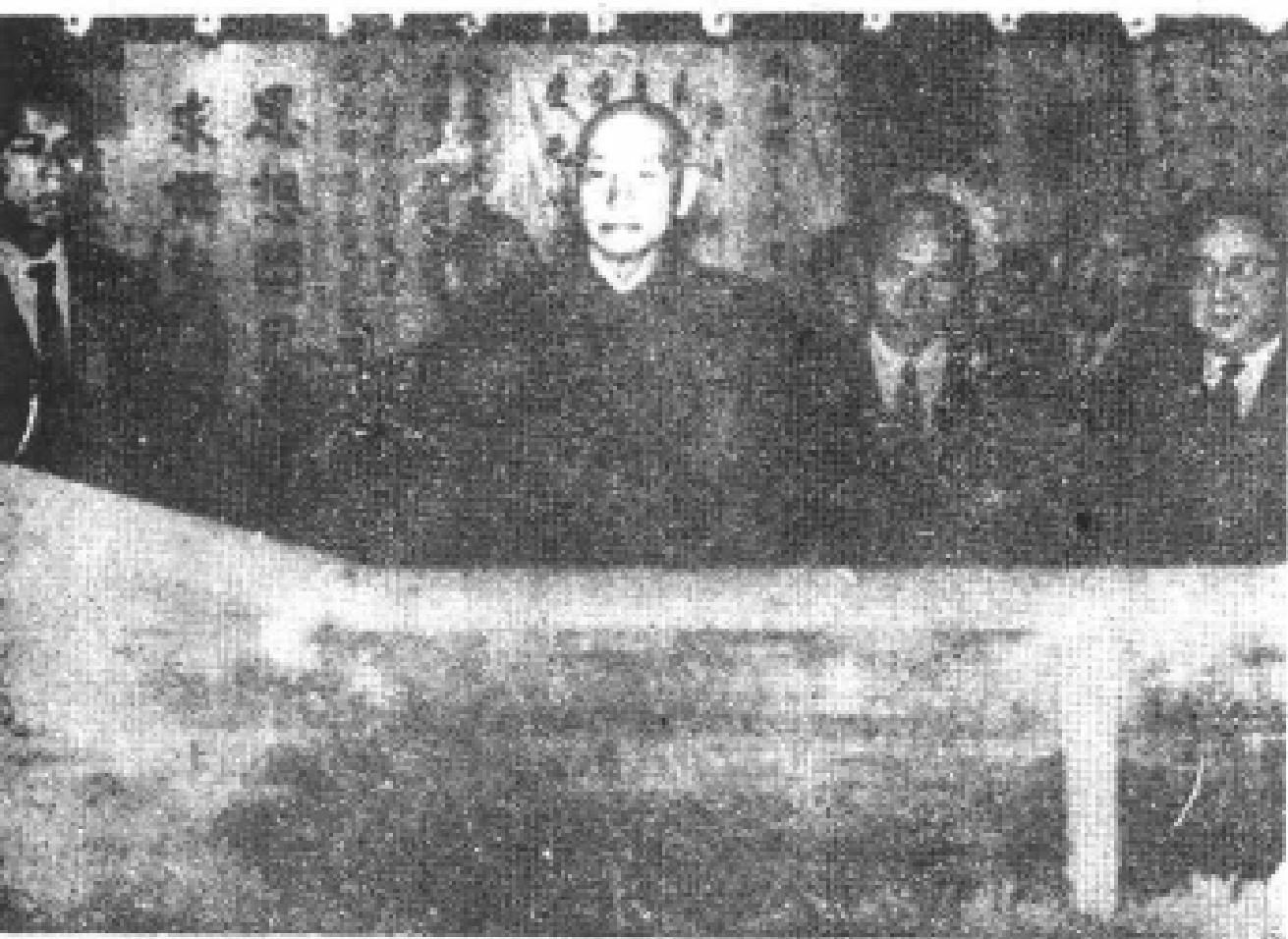
11/25/1903



11/25/1903

八五

總統蔣中正臨視胡先生遺容



152 25版

陳副總統奉全體治喪委員會公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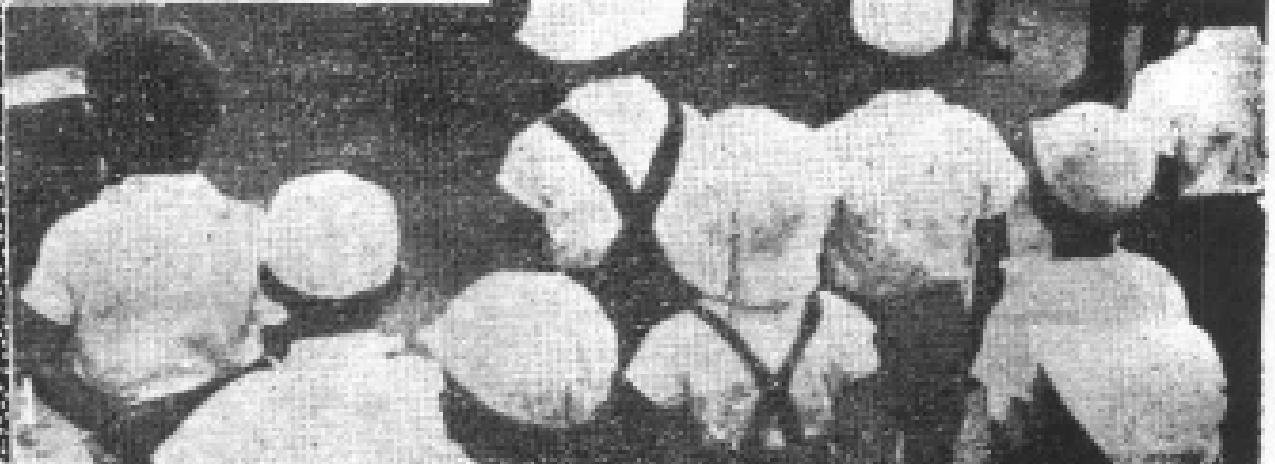
(上) 卅五年十一月廿二日任第一屆國大

第一次大會主席。

(中) 胡先生在做「工」。

(下) 四十八年六月廿八日主持舊莊國校

開學典禮。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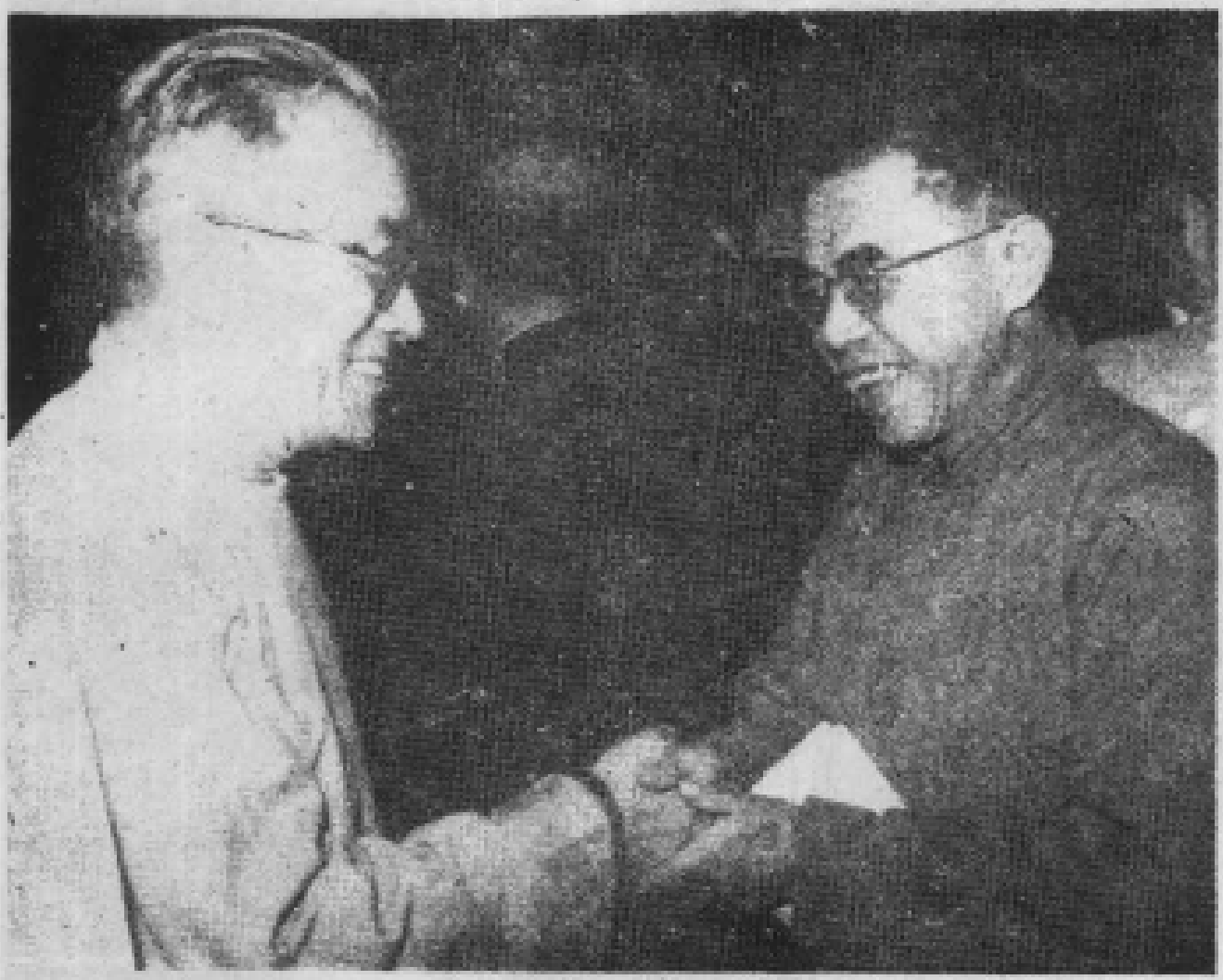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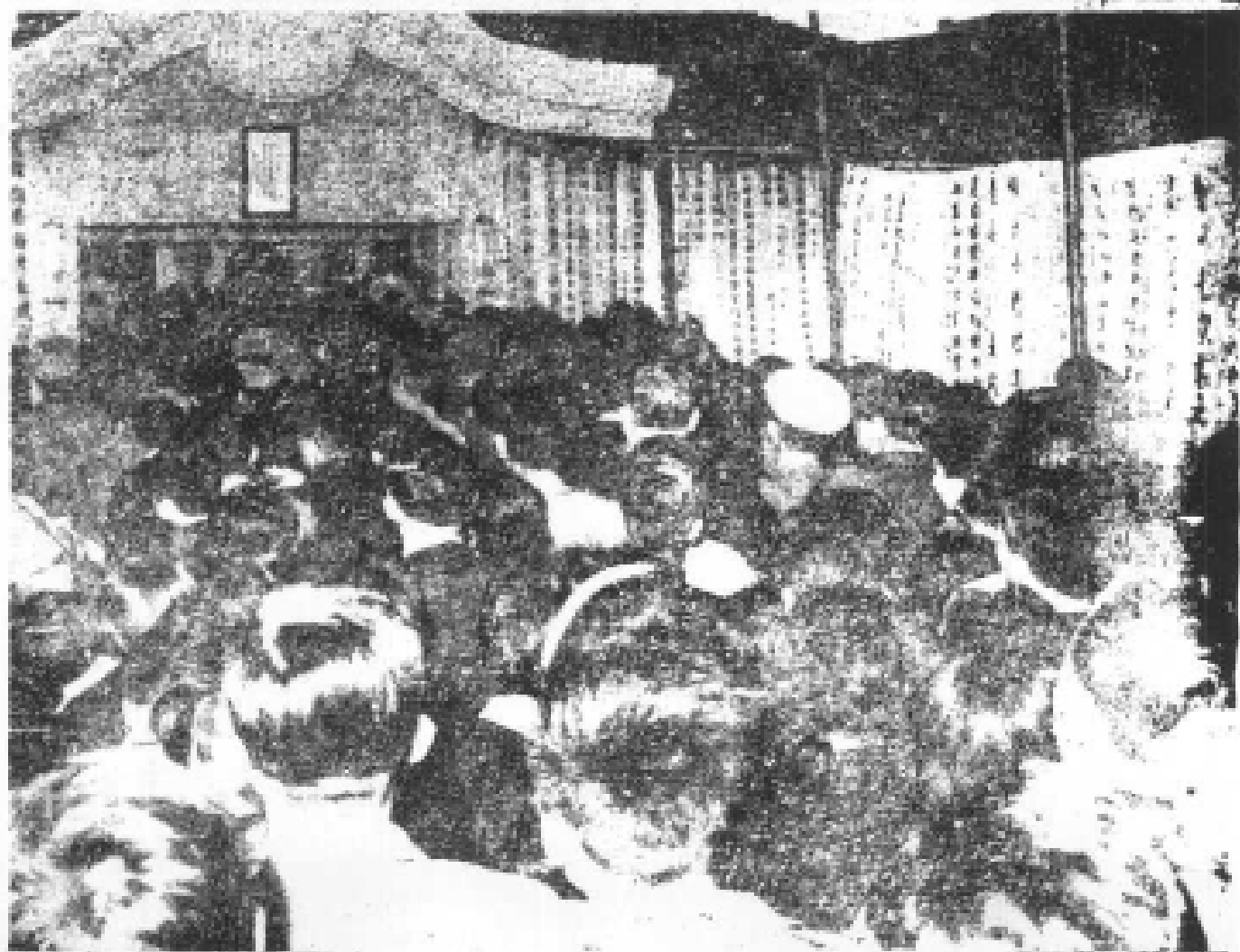
胡適之先生與新院士陳樂振握手祝賀



酒會甫散胡先生心臟病遽發倒地經急救同救



胡先生移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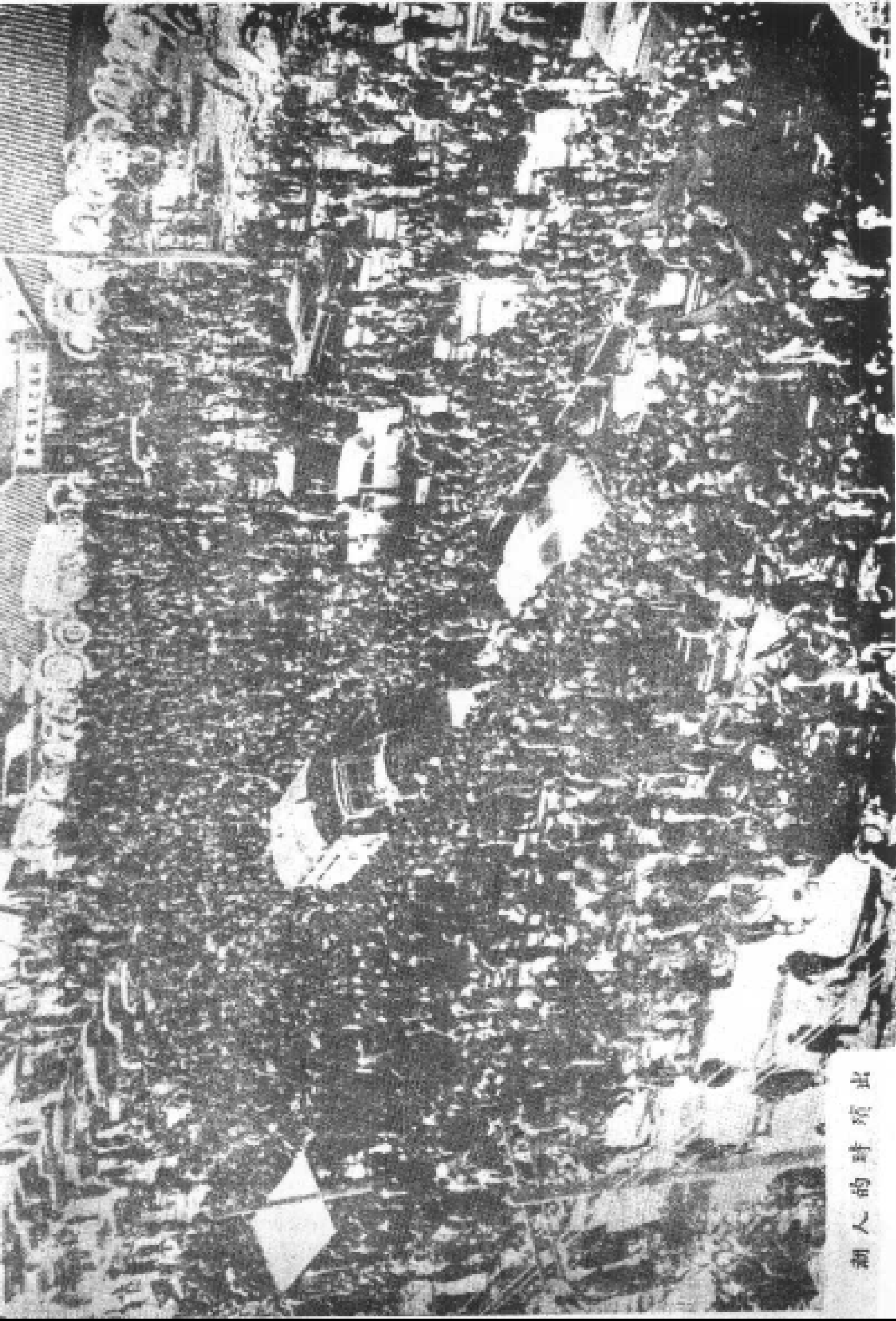


胡人的祭公



(上) 出殯時的路祭。
 (中) 胡適先生之靈位。
 (下) 移靈南港暫厝。





湖人的时顶出

· 目 錄 ·

胡適之先生的生平和著作·····	(一)
胡適之先生的最後一天·····	(三)
胡先生遺囑·····	(五)
移靈、瞻仰遺容、公祭、出殯·····	(八)
胡適思想對於現代中國青年的影響·····	(一一)
見微知著話胡適·····	(一四)
我所親炙的胡適之先生·····	(一七)
深夜懷友·····	(二〇)
敬悼胡適之先生·····	(二二)
天，爲什麼不許他再活十年·····	(二四)
胡適與政治·····	(二七)
胡適之先生二三事·····	(三一)
趙元任在美哭胡適·····	(三四)
我記憶中的適之·····	(三八)
胡適思想在大陸·····	(四一)

敬悼胡適博士	(四四)
敬悼胡適之先生	(四五)
大星之隕	(四七)
自由・科學・理性	(四八)
敬悼胡適之先生	(五一)
胡適與言論自由	(五二)
悼念胡適之先生	(五四)
祭文	(五六)
輓聯集	(六一)

胡適之先生的生平和著作

先生字適之，生於民前廿年十二月十七日，享年七十一歲。先生原籍安徽績溪，自幼聰穎過人，八歲時已能自修讀書，清光緒卅年赴上海，入梅溪學堂，繼入澄衷學堂，每次考試必列第一名。宣統二年，考取官費留美學生，赴美國入康奈爾大學農科，不久改讀文科。以論文得柯生獎學金。嗣改入哥倫比亞大學，就學於名哲學家杜威博士，因著先稟名學史一書，得哲學博士，其才氣縱橫，文名已先揚於世界。

民國六年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即努力於白話文運動，並刊行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所著文學革命論文及白話詩等，引起舉國注意，一時毀譽畢集，然其主張終在中國得以闡揚光大。嗣漫遊歐美各國。

民十七年，回國就任中國公學校長，民十八年被推為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會董事，民廿年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七七」抗戰爆發，離平赴歐美各國聘問。

民廿七年九月任駐美大使，因其學術界地位之崇高，甚受美國朝野敬重，於戰時外交多所貢獻。勝利後，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卅五年及卅七年兩次國民大會，均被選為國大代表，並被推為大會主席。

卅七年底大陸剿匪局勢迫轉，先生以「苦撐待變」四字勉勵華北軍民，其本人於北平陷落前夕始南下，嗣即赴美國講學，四十一年十一月及四十三年二月，曾兩次返國

講學，四十六年二月在美國施行胃潰瘍剝治手術，四十七年四月返國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先生早年心臟即呈衰弱，四十九年三月九日發生近年來首次心臟病，進入臺大醫院休養，因病狀輕微，旋即康復出院，五十年二月廿五日舊病復發，再入臺大醫院，至四月廿二日出院。

胡夫人江冬秀女士遠居美國，因胡先生生病，決心回國陪伴，於同年十月十八日抵臺，十一月廿六日，先生再感不適，進入醫院，並在院中渡過其七十歲生日，至今年元月十日始出院返家靜養。

先生於二月八日曾出席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並於逝

世當日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會議，因久病之身，不堪勞累，病逝會場。此一偉大學人之死，實爲我國學術界莫大之損失。

先生所主辦過的刊物，有競業旬報、留美學生季報、新青年、每週評論、努力週報、現代評論、新月雜誌、大公報學問論文、獨立評論。

先生的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即中國古代哲學史；卷中即古哲學史前七章），每篇小說（選譯，第一集；第二集）；嘗試集（新詩），胡適文存（一、二、三、四集，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即文存第四集），章實齋先生年譜，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即先秦名學史），新學制國語教科書（初中用，與顧頡剛、葉紹鈞、吳研因合編），戴東原的哲學，詞選（選編），白話文學史（上卷），廬山遊記，人權論集（與羅隆基、梁實秋合著），神會和尚遺集（校編），胡適文選，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前九章，油印本），淮南王書，中國文學史選例（卷一，古代），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十二講），四十自述（第一冊），中國文藝復興（英文），哲學的改造（與唐肇黃合譯），南遊雜憶，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選編），張菊生先

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與蔡元培、王雲五合編），藏輝劄記（即胡適留學日記），中國也正爲保衛一種生活方式而戰（英文），胡適的時論一集，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齊白石年譜（與黎錦熙、鄧廣銘合著），水經注版本四十種展覽目錄（北大五十週年紀念），臺灣紀錄兩種（與羅爾綱合校編），胡適言論集（甲編；乙編），丁文江的傳記，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

先生的學經歷：美國康奈爾大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歷任北京大學教授、系主任、院長、校長、光華大學教授、中國公學校長兼文理學院院長，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兼編譯委員會主任委員，德國普魯士學會會員，駐美國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名譽顧問，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美國蓋斯特圖書館館長，國大代表，中央研究院院，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胡適之先生的最後一天

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廿四日是胡適之先生生活在人間的最後一天。他從上午九時到十二時，於南港中央研究院主持第五次院士會議及選舉四十九年度和五十年度的新院士。他在會議中並沒有講很多話。散會後，胡先生招待院士午餐，一共兩桌，快到兩點鐘才散席，他休息了一下，差不多到四點鐘起來，據說休息時睡得很好。

酒會是下午五點鐘開始的，這是個永久值得記憶的集會，這是胡先生最從一次與學人們聚會，與會學人們將自己對國充滿熱情，坦誠道出，使聚會從輕鬆到興奮熱烈。唯一的遺憾是胡先生在激動下疾發而逝。

最初，胡先生以愉快的口吻，正常的氣色，在酒會中致詞。他說：各位朋友，今天很高興，中研院遷臺以來，這是出席院士人數最多的一次院士會。記得第一次院士會議在大陸舉行，在一百五十位候選人中選出了八十一位院士，幾乎集合全國各種科學領導人才，可惜八十一位中，一些年高去世，一些無法逃出，淪陷大陸。使中研院在臺恢復後，只有十九位生活在自由世界。

胡先生說，現在我們在此山上，可以看到物產進步的情形，可是剛遷來時，院裡放書的架子也沒有，同人住處也沒有，在楊梅借了一個堆棧，連床也沒有。那時政府在戰時，很艱苦，一直到近六年，得到幫助才開始慢慢恢復，現在已有七個研究所，開過四次會議，選舉了三次院

士。

「我們十幾年來，在孤島上，臺灣寶島上，離羣索居，在物質的困難，精神的困難之下，還做了一些工作」胡先生欣慰的說：「尤其覺得高興的，是今天有四位院士遠道而來，使我們感到這些工作，還有一點點價值，值得海外人士回來一顧的，希望以後再回國時，能邀請更多人一同回來，好給我們一些「烟土披里純」，也就是鼓勵，和靈感。」

接着胡先生提出一個得意的故事，他說：幾年前我就對朋友說過，自己雖然對物理學一竅不通，但是有兩位學生是物理學家，一位是吳健雄，一位是饒餘泰，我雖不教他們物理，他們自己努力成了大名，可是今天幾位海外院

士中午相聚時，兩位吳博士談排行，吳健雄說：「我高一輩，該叫師叔」。原來吳大猷先生，還是饒德泰的學生，而湯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這麼一來，我的第二、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學家，我的第四代還得了諾貝爾獎金呢。我雖然對物理一竅不通，但是非常得意。

胡先生以「太太沒來，多說了幾句話」作爲他的致詞的結束，接着在請院士講話時，竟稱：「今天我將這個會交給李濟等幾位先生，請他們說說話。」一句交出這個會的話，竟成了讖語。

在臺院士凌鴻勛、李濟及海外歸國的吳大猷博士相繼講話，所說都是對當前學術工作的建議。

凌鴻勛博士說，中研院遷臺後，面臨兩個新環境，在內部，是需要慢慢的恢復當年的規模，另一新環境是在此非常時期。既要鞏固臺灣，加速經濟發展，又要準備反攻復國。今後研究工作恐脫離不了這兩個範圍，希望院士們在不開會時也想想這些問題。

李濟博士支着拐杖，以半病之身起立發言，他說近年來他一直很悲觀，今天中研院開院士會，又有海外學人歸來，好像在辦喜事，喜事重重下，竟使他的悲觀一掃而空，覺得還值得再活一、二十年。

四

李濟博士說：中研院擬定的職務除選新院士、評議員外，還有擬訂國家學術方針及研究政府交議事件，我常常想訂組織規程的這些學人，心目中究竟想到一個什麼目的？猜想恐怕是想提倡院士制度，樹立中國獨立的學術中心，意見說來廣泛，實際也許是樹立一個科學研究中心。中研院開創的元老，如蔡元培、蔭本棟等，都很重視現代科學，而且對中國文化的缺點很了解，最缺乏的就是科學研究，所以想藉此提出。可是成立卅年來，和提倡科學運動五十年來，成績雖不多，也有，只要下決心，可以做得好，是進步可喜的現象，但是這其中並非沒有問題，就中研院來說，所謂擬定國家學術的方針，是個任重而道遠的事，如何交待？各位院士不妨特別去想一想，因爲最近發生的幾樁事，尤其需要想想。

於是李博士提起了胡博士被「圍剿」的一樁事，他說十一月間，一些外國人也許出于善意的，邀請胡適先生演講，並定題爲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意思是問科學在中國生根，應當如何改革，胡博士作了一個簡單的答覆，誰知臺灣輿論界引出不同的反應，使我們關心科學發展的人，想到科學研究究竟應佔個什麼地位，社會中有若干人應該有機會去想想，交換一下意見，分析一下，科學的

分析一下。

他說：我感到科學在中國社會生根不成，是最大的問題，經過五十年，今天我們的成績如何？一切設備是向外買來的，學生必得出洋去，有什麼中文的科學著作？我不敢樂觀，我要保留，科學不能在這裡生根，就總覺得它是舶來品。李濟博士又說，我提出這個問題並沒有答案，是我四十年來都有興趣的問題，現在供給大家想想。

胡先生錯點吳健雄博士代表海外院士致詞，吳博士向老師更正後，由吳大猷博士講話。

吳大猷博士認為李濟先生不必過份悲觀，他認為科

胡先生遺囑

胡適之先生會于生前一九五七年（民國四十六年）六月四日在美國紐約一家律師事務所內立下遺囑，這份遺囑是英文打字的，其主要內容可分為下列幾點：

① 遺體火葬，骨灰由執行後事者處理。
② 從北平逃出來時，遺在北京大學的一〇二箱書籍，等光復大陸後，北大成爲自由的大學時，那些書全部捐給北大。

③ 一位外國朋友替我（胡先生自稱）畫的畫像，贈給中央研究院作爲紀念。
（按：該畫像現在臺灣）

④ 存在家中尚未出版的文稿、論文、和書籍，全部送給國立臺灣大學。

⑤ 所有文稿均請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楊聯陞及國立臺灣大學教授毛子水兩人，來整理安排出版。

⑥ 個人留下的財產，如夫人胡江冬秀女士健在，均留給胡江冬秀女士，不然留給二子胡祖寧、胡思杜，如二子僅一人健在，即留給該子及其子女享用。

⑦ 一時想不到的事情，均授權執行後事者處理。

胡先生會在這份遺囑上簽下英文名字，另外有四位見證人也簽了字，這四人是駐加拿大大使劉鐸、駐紐約總領事游建文、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秘書葉良材，及一位美國人雷哥曼（Riegelman）先生。

學不能在國內生根，科學家却在國外生根，是國內缺乏環境的原故。因為在國外得到博士，只是達到研究學問的一個人門，如果那時就回國來，除非天資特殊，否則所受訓練不夠，再不用功的話，就無法繼續研究下去，只好就已有的知識教學生，做爲事業。他說：我們要把基礎先栽培起來，才能慢慢發展，以楊、李之天資也得有八九年才能成熟，一個天才尙且如此，國家的發展，更得加倍的時間，至少廿年才能有基礎。我們不必悲觀，留學生出去幾百，最好讓他們成熟，十個人有一個回來也很好。

吳博士大聲疾呼說：「科學發展沒有捷徑，有人說我們須迎頭趕上去，我不知道如何趕法，因爲科學發展絕沒有捷徑！」

劉大中博士對中研院寄贈的刊物致謝後。胡博士作結語，這是他臨終前最後的一段話。

胡先生說：我讀成吳大猷先生的意見，要培植年青一代，讓他們多在國外研究以及科學要從基礎做起，按步就班，不取捷徑的主張。他認爲李濟的「科學思想在中國生根不樂觀」的看法，未免太悲觀了。

他說：我們從底下慢慢做上去，中央研究院從來不談太空，幾年來，我們都是用政府的力量，和自己的人才來

研究科學，中央研究院成立時，曾想設立三大中心；一、數理研究中心，二、生物科學中心，三、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但因抗戰、戡亂，一直沒有實現。

胡先生說：「我們現在不要談什麼太空，這是得不到的，臺灣全省連一個完整的物理學系都沒有，就想上太空，這是不可能的。」

他又說：我們要先學爬，然後學走，這樣也許慢慢地自己可以做輪船，做飛機，也許可以上天去。

胡先生說：四十年來，他一直受各方面「圍剿」，「我從來不生氣，並且非常歡迎。」他說，這才表示言論自由。他還請回國的海外院士，去參觀立法院、監察院和臺灣省議會。他說，立法院新建了一座會場，在那兒，委員們發表意見，批評政府，充分地表現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監察院在那個破房子裏，一羣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討論批評，還有臺灣的雜誌，大家也可以看看，從這些雜誌上表示了我們言論的自由。

他聲竭力嘶大聲疾呼之後，也許已經感到不適，急忙接着說：「好了，大家再喝酒，吃點點心吧」。

酒會是在六時卅分結束的，與會人士在歡笑中陸續離去。

因為參加酒會的人數不少，胡博士當時慢慢移動脚步，一面在與海外歸來的袁家驛博士閒聊。頃刻間，胡博士突然面色大變，他的頭會在放着茶點的方桌上撞了一下，然後平躺在地上，這一突變，震驚了尙未離場的人，連已經跨上汽車的人也都匆匆地趕進來。

這真是任何人料想不到的變故，一時弄得全場的人手足無措，經常照料胡先生生活的王志維秘書，一直抱着他的頭，遼大醫院的魏火曜院長也馬上脫了西裝上衣按摩胡博士的胸部，幫助他的心臟跳動。

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人們，很快的抱來一個「氧氣筒」，兩個枕頭和一條棉被，並且請來了附近的醫生，這位醫生在魏火曜院長指導下，一連直接在心臟部位注射三針強心劑，當時魏院長即認為希望很渺茫，但並沒有對在場所有心情悲戚的人們透露。

這是一段氣氛最沉悶的時間，所有的人都默默地等待着奇蹟的發現，胡博士的臉色由白變黃，一位女太太忍不住哭出聲音來，也更增加了在場人士的悲痛。

吳大猷博士很悽喪地說：這真是想不到的事，假如酒會中不要講太多的話，也許不會發生意外。

當時在场的基督教徒，站立在胡適博士的身邊，默默

地閉上眼睛爲他祈禱。

七時廿五分臺大校長錢思亮正焦急地在門口等待臺大主治醫生，一輛計程車載來了唯一的希望，但是，坐計程車來的醫監却宣佈了最壞的消息。

醫師在胡適之先生的胸部聽了一下，即宣佈胡先生已在十幾分鐘以前逝世。

這一宣佈，所有的人潛然淚下，中央研究院的職員們都痛哭流涕，眼着着這位一代學人蓋上白色的棉被，留給人們無限的懷念。

移靈·瞻仰遺容·公祭·出殯

八

胡適之先生的遺體，於二月廿五日上午十時五十分移入臺北極樂殯儀館的靈堂。

從上午八時開始，治喪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王雲五、張羣、于世杰、羅家倫、莫德惠以及生前友生數百人懷着悲痛的心情，陸續前往瞻仰遺容。還有不少沒有見過胡先生的人，也紅腫着眼睛向胡先生的遺體行禮致敬。

張羣秘書長於上午到達殯儀館時，曾表示 總統的關

懷。

胡先生的遺體是上午十時五十分由于世杰、陳雪屏、羅家倫、錢思亮、程維賢、楊樹人、胡頌平、張祖貽從化粧間恭送至靈堂。胡先生穿的都是他最喜歡的衣服，經過化粧後的胡先生除了臉色顯得蒼白外，神態極爲安祥。

靈堂裏一片肅穆，胡先生的遺像在燭光閃爍中帶着生前的微笑，但是前往致弔的人們却對着他的遺像流下悼惜的眼淚。

廿六日，胡先生的公子胡祖望自美國任所趕返臺灣奔喪，甫下飛機，他聽到錢思亮先生所述說的經過後，即抑制住內心的悲痛首先馳往靈堂致祭，並再到福州街寓所安慰母親江冬秀女士。

午後，胡祖望與他母親提起遺囑裏關於火葬的事。胡祖望表示完全聽從他母親的意思，最後由江冬秀女士決定用棺葬。

蔣總統長公子蔣經國，廿六日上午到臺北殯儀館憑弔胡適博士，他在滿佈鮮花、水奠的靈前鞠了三個躬，然後到白色布幔的後面，瞻仰胡博士遺容。

他還到福州街慰問胡適夫人江冬秀女士，勸他節哀保重。

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教育部長黃季陸，廿六日也會到福州街二十六號胡適博士公館，探慰胡博士夫人江冬秀，勸慰她節哀，保重身體。

數以千計的大學、中學的在校男女學生，冒着大雨跑到臺北市極樂殯儀館瞻仰一代學人胡先生的遺容並鞠躬致

敬，他們大部份是成羣結隊前往，並在靈堂外的簽名簿上寫下「臺大學生」，「師大學生」或「北二女初二學生」……等然後離去。

廿七日晨故胡先生移靈極樂殯儀館，設靈供人弔唁的第二天。臺北市一直落雨的天氣顯然沒有阻礙了國人對胡先生的崇敬。

廿八日，胡先生生前友好和從未晤見過的民眾，仍自朝到晚絡繹不絕地到靈堂，弔唁這位一代哲人。

蔣總統於三月一日中午蒞臨臺北市極樂殯儀館弔祭胡適博士。胡適博士的長公子胡祖璋在靈堂答禮。

總統由秘書長張羣陪同前往，於十二時十五分步入靈堂，在胡適博士殯前行三鞠躬禮，然後瞻視胡博士遺容。

總統關懷胡適之先生的身後，告訴站在他身旁的胡祖璋，要他勸慰他的母親節哀，不要過度悲傷。

三月一日廣大的人潮冒雨湧進臺北市南京東路的極樂殯儀館，瞻仰一代學人胡先生的遺容。

這個廣大的人羣，包括各階層的人士，以及少數的外國友人。估計人數超過三萬人。

一日是治喪委員會安排的公開瞻仰的日子，胡先生的遺體已移置在極樂殯儀館的極樂廳內。一幅他生前六十九

歲生日時的放大照像，懸掛在靈堂的正中央，遺像的上方是蔣總統親題頒贈的「智德兼隆」輓額，遺像的兩旁掛着陳副總統致送的輓聯。胡先生安詳的躺在一張置有紗罩的靈台上，台的四週滿佈着鮮花，鮮花由一塊約八尺見方的地面簾上靈台。鮮花的四週圍繞着一圈以紅絨做成的欄柵，各界致送的精緻花籃，分佈在靈台的四週與靈堂內四個紅漆油柱的周圍。

這些前往瞻仰胡先生的人們，都會在上天廳的簽名處簽下了他們的名字。

一日雖然整天陰雨，並沒有影響這些人對胡適之先生的敬愛與瞻仰他遺容的熱誠。尤其是傍晚時，瞻仰遺容的人們擁塞在靈堂前的竹棚裏，一分鐘進入靈堂的達七十人以上。

胡適之先生遺體於二日下午二時半火殮。他的靈柩在二時五十分發靈發引，經過人羣夾道的南京東路、敦化路、中正路、松山，到達南港中央研究院。暫厝在中研院的舊會議室裏。

二日是胡適之先生逝世後的第一個好天氣，公祭是日上午八時開始。第一個公祭單位是總統府，由張岳軍秘書長主祭。治喪委員會是在九時半公祭，陳副總統主祭，然

後有七十多個團體相繼行祭。

菲律賓、美國、越南、韓國、日本、土耳其、秘魯、委內瑞拉、巴西、泰國、瓜地馬拉、多明尼加、哥斯達尼加、約旦等國駐華使節，於上午十時三十分公祭，他們在胡先生的靈前獻花，行禮。

參加公祭的學生，都穿着制服、黑鞋，私立銘傳女子商專的一千位女學生，由她們的校長包德明率領，分六批公祭，包校長的哭聲和胡夫人悲痛泣聲，使大家都哭了，可憐也泣不成聲，對着麥克風講不出話。

參加公祭的七十多個單位，有十三個做了祭文，但是都沒有在當時宣讀。

下午二時十分公祭結束，靈堂外面還有數千人希望向胡適博士行最後的敬禮。

公祭的時間，較原定的下午二時完畢延長了十分鐘。二時十分停止公祭後，治喪的工作人員將靈堂裏家屬以外的悼客請離靈堂，舉行家祭。胡夫人江冬秀女士和公子胡祖望，悲傷的啼哭聲，使擠在靈堂門口的人們，也悲感不已。

胡適之先生的遺體，是準二時卅分躺進棺木，胡適之先生安詳地躺在裏面，並給他戴上了眼鏡。胡夫人由親友

扶着最後一次看「老伴」的遺體，她會痛哭抓住棺木不肯離去，工作人員很快地將機木蓋上，親友們才把胡夫人勸走。

正式蓋棺後，程天放、羅家倫、毛子水、陳雪屏、楊亮功、黃季陸在靈柩上覆上北大的校旗，再覆上一面國旗。治喪委員會的全體委員由張岳軍秘書長領導在二時五十分行禮後，旋即啓靈發引。

執紼送殯的各界人士，步行送到松江路口，孝子胡祖望叩謝後，分別搭乘預備的車輛轉入敦化路、中正路、松山、南港。

寬敞的南京東路，夾道擠滿了哀悼胡適之先生的人羣，所以車輛行駛的速度很慢。由敦化路轉入中正路，情況依然。

車隊經過松山進入南港鎮的轄區，民衆悼念胡適之先生的情況更爲深切，很多民衆在他們的門前擺着祭品，路祭這位曾與他們住在同鎮的一代哲人。中央研究院附近的中興街，全街的民衆集中在街口擺着最豐盛的祭品，中央研究院的員工眷屬，也在中研新村路祭胡院長之靈。

靈車是四時廿五分到達中研院門口，代理院務的李濟偕同各所同仁向故院長靈位獻花致祭，由孝子胡祖望下車

答禮。

靈柩是四時卅分進入設在舊會議室的靈堂，靈堂正前方懸着 總統題的「智德兼隆」輓額，靈柩前仍放着胡適之先生六十九歲生日照片、靈位和祭品。治喪委員會先

讓民衆進入靈堂參觀行禮後，治喪委員會的全體委員再行三鞠躬禮安靈。

胡夫人率胡祖望在南港寓所休息了片刻，始由親友們陪同到靈堂祭靈。

毛子水教授談：

胡適思想對於現代中國青年的影響

胡適博士的老友，國立臺灣大學的毛子水教授，昨天以萬分沉痛的心情，與記者談起胡適思想對於現代中國青年的影響。毛子水教授與記者談話時沒有流淚，但從他那啞澀的聲音和沒有表情的面孔上，我們可以深切的體會到，他的淚是已在流着，而且不斷地流着，祇是這「淚」不是奪眶而出的淚，而是流向眶內的、流向心底的淚。

毛子水教授說，一提到胡適之這個名字，人們便會聯想到白話文和所謂「新文化運動」。把胡適之和白話文以及新文化的關係弄清楚，那末，胡適之先生的思想對現代中國青年的影響便瞭解了。

他說：胡適博士提倡白話文，可以說是他對我們民族最大貢獻之一。他在民國六年一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雜誌發表的「文字改良芻議」便是我們語文改良的發端。自從這個芻議發表以後，三四年裏，白話文便成了我們正統的「國文」，因為教育部在民國九年頒佈了一項命令，要國民學校一、二年級的國文，從九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國語。毛教授指出，白話文並不是胡適博士所發明，用白話來作文學亦不是從胡適博士才開始，但是却是經過了他的提倡之後，才被視作正式「國文」。白話文成爲正式「國文」，可以說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件極其重大的事，從這

件事，我們的青年不知節省了多少心力的耗費，不知道在文學的創作方面獲得了多少方便和利益。

毛教授似乎無限感慨地說，白話文被定為正式的國文，到現在已有四十多年了，孔子曾經說過「四十而不惑」，從民國九年到現在這四十多年中，我們的國家固然多難，使我們邦人君子沒有閒情逸致細思文化上的問題，但世界文化潮流的激盪，使人人有日新月異的感覺，已不容我們自安於固陋了，而我們國內許多教育家，竟尚有誤視白話文對於我們這一代的重要性，大學入學考試的作文試題，多註有「文言白話不拘」的字樣。

談到「新文化」，毛子水教授說：「新文化」這個名詞，意義很複雜。但如果五十年來，我們中國有所謂「新文化」，照他的意思，胡適博士應該是一個主要的傳播人。他指出，胡適博士介紹實驗主義 (Pragmatism) 於國內，比起清代嚴復的介紹天演學說 (進化論) 於國內，意義更為重大。他說，我們若摒除哲學上微細的分辨不論，而就思想的體系來講，則實驗主義正可以說是採用自洛克以來英國經驗學派各大哲人所慣用的思想方法而加以改良的。這非特是探求真理一條平穩的大道，亦是人生行為上一比較適用的原則。在專治哲學的人，自不妨對實驗主義作

吹毛求疵的探索，以期真理愈辯而愈明；但就平常一個受教育的人講，則服膺實驗主義，可以希冀達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的境地，乃是最切實用的「聖學」。

毛子水教授強調說：胡適博士不只是宣傳實驗主義，並且應用實驗主義來論事和做學問。在他數百萬言的著作裏，幾乎到處都表出實驗主義——「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的精神。他的提倡「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的高呼「拿證據來」的口號他的，他的勸大家「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他的希望各種思想各種信仰的人都能保持一種「容忍」 (Toleration) 的態度，以及他的勸大家認清：我們真正的敵人是「成見」是「不思想」——這些都是治學、論事和做人的金科玉律；這些都可以說是源於他的「實驗主義的」。

毛子水教授說：但四十多年來，胡適博士的思想方法和態度，影響於我們的青年，於治學方面則頗重大，而於論事做人方面則很輕微。

他說：民國八年，胡適博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 出版，我們國內的學子，從此以後，凡能讀到胡博士著作的，差不多都能知道中國古書的旨趣和研究中國古代思想的正常的途徑了。他強調說，我們中國人應用現代

方法以治學而有極好的成就的，要算他的這部書爲首。他指出馬氏文通的出版，比中國哲學史大綱要早二十年，馬建忠探索的功夫亦很值得我們的稱讚，但馬氏以未能採用當時西方人士對於文法研究的最進步的方法，所以他的義例，沒有能够使讀者十分滿意。自從有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以後，四十多年來，我們國內關於中國學術的著作，無論是批評文學或研究歷史的，多多少少都受了這部書的影響。毛教授說：研究學問的事情，自然是「後來居上」的，我們固然不能說他這部哲學史是空前絕後的，但我們可以說，設使沒有這部書，恐怕有許多現在成名的學者，當時會不知道從何下手去做學問。至於他所寫的其他和做學問方法有關的文字，如「紅樓夢考證」，「同學季刊發刊宣言」等等，都是開一代風氣的。它們的影響，可以說沒有讀書人不知道的。

至於胡適博士的思想對於青年人心術和行爲的影響，毛子水教授認爲，不及他（指毛教授自己）所期望的那麼大。他說：他不敢說：這四十多年來，我們中國沒有若干青年因爲讀了胡適博士的著作而徹悟個人對於社會的責任，便成爲有益於社會或至少無害於社會的人，他同時也不敢說：這幾十年來，我們中國沒有青年因讀了胡適博士的

介紹「實驗主義」的文字便知道「成見」是自己的敵人，而走上「容作聖」的大道的。但他却敢推測，有是有的，祇恐怕不多。

毛子水教授說：胡適博士在治身制行上這樣，在政治見解上亦是這樣。他一生最盼望少年朋友們學得「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的精神，學得「撇開感情，只認事實，只跟著證據走」的態度。他以爲「用這種態度來做人處事，可以不至於被人蒙著眼睛，牽著鼻子走。」而我們的青年却沒有把他提倡的這種態度應用在政府和社會的行爲上。他在他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胡適文選序）的最後一段裏說：「從前禪宗和尙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裏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一個人不受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力量，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本領，努力做一個不惑的人。」

毛教授說：以上是胡博士三十多年前的話。那時一班青年多感於共產主義，所以他鄭重的說這段話。若使當時的青年人肯細心讀他的文章和細心去思想他的話，定有許多

多現在的匪幹，會不願意去讓共產黨牽著鼻子走的。

他最後說：四十多年來，胡適博士對國家，對青年人，應該說的話差不多都說過了。他以為他的許多話，是永遠不會失時效的，只要青年人能夠時常仔仔細細去想他的話，在道德和學問上，定可得着極大的益處。胡適博士一

生愛護真理，愛護國家，愛護青年。他是我們這一代一個懂得怎樣使國家成爲一個「文明國家」的人。希望我們的青年朋友，能對真理從事探索，對國家有所建樹，以慰他在天之靈！（轉載五十一年二月廿六日臺北中央日報）

見微知著話胡適

——訪李濟教授談胡適行誼

胡適博士生前的一位好友，昨天抱着無比沉痛的心情對記者說，遠在過陽曆年的時候，他就有一種不幸的預感，但他却不知道，這一不幸的預感，會發生出什麼不幸的事來，他說：「也許你會笑我，這豈不是太迷信了，」但不管迷信不迷信，現在他的朋友胡適之先生是突然地去世了。

過關不順利

胡適博士的這位好友，便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李濟博士，由於胡適博士的突然去世，悲傷過度，身體感到有點不舒服，現在家中靜養。他告訴記者他的預感是由於在陽曆一月一日玩洗牙牌「過五關」而起，他常用玩「過五關」的好壞來卜吉凶，今年陽曆一月一日，他一連玩了三次，都未能順利過「關」。

李濟博士說，他與胡適博士雖是多年老友，但是他對胡適博士對於他所研究的這一行感到有興趣，所以常常是真正的有所認識，却還是近幾年來的事。他說：在過去，直接或間接的給予他不少的鼓勵，那時的他，對於胡適博

士，祇是單純的佩服而已，直到他與胡適博士在中央研究院共事後，他們之間才真正的有了友誼，才真正的對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李濟博士由於他的過度悲傷，不願與記者多談關於胡適博士做學問的事，但他却說了好幾個有趣的故事，來說明他的做學問和處世為人的態度。

一語釋宿嫌

第一個故事是一個很老很老的故事，這故事是許多人知道的，這故事是說，胡適博士有一位朋友叫做丁文江，他是我國地質學的領導人，丁文江先生與胡適博士交情很厚，可是他在我國國民政府成立以前，曾與孫傳芳很接近，並且當過上海的督辦。傅斯年對於他的這些行為很痛恨，認為「丁文江可殺」，傅斯年也是胡適博士的好友。國府成立之後，大概是在民國十八年左右，有一次趙元任請客，那天有胡適，有丁文江，有傅斯年，也有李濟，大家都知道傅斯年很恨丁文江，也都知道丁文江知道傅斯年說他可殺，因此大家都很擔心，他們見了面後這宴會的空氣會變得怎樣。可是胡適博士却很風趣的給他兩人作了一番介紹：他把丁文江拉過傅斯年一邊介紹說：「在君呀，

這就是要殺你的傅孟真！」當下兩人由於胡適博士的風趣介紹，不但過去的成見全消，而且從此以後，做成為最要好的朋友。

不輕易役人

第二個故事是在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選舉以後，全國各地大學均邀請院士們前往作學術講演，武漢大學也派人來邀請院士們前往演講，他們請了胡適博士也請了李濟博士。李濟和胡適一起到了武漢大學，大學的招待人員把他們兩人放在一起居住，並且共用一個洗澡的地方，工友對他們的照顧也很好，每天都把房間收拾得很乾淨，洗澡盆也擦得很清潔。李濟博士天天洗澡，可是他有時看到胡適去洗澡，有時又不見他去洗澡，李濟忍不住問胡適說：「一天講演下來已經很累了，為什麼不洗個澡舒服一點呢。」胡適博士回答他說：「我有一個習慣，洗好了澡，一定要把洗澡盆洗乾淨。」他的意思是他演說的很累了，不再願意擦洗澡盆了，本來他是可以洗完了澡把水放了就好了，但他又不願把洗澡盆上的污垢留到第二天讓工友去擦洗，因此他寧可不洗澡，李濟博士聽了很感動，他常洗澡，却從來沒有自己擦洗過澡，他聽到了胡適博士的這句話

，從此就改變作風，洗完了澡一定把澡盆擦洗乾淨，直到如今。

生活求規律

在這次武漢講演的過程中，胡適博士還對李濟博士提出了刷牙的方法。胡適博士對李濟說：「我從小就看到許多朋友，做什麼事都是學人皮毛。譬如刷牙，十個人中間起碼有好幾個都不會。」他說：「我刷牙是照例順著次序上下左右裏外刷的，每邊擦二十次，左邊上二十次，左邊下二十次，右邊上二十次，右邊下二十次，裏面上二十次，裏面下二十次，然後再外邊上二十次，外邊下二十次，這樣不但上下左右裏外外都刷到，而且在用牙膏方面說來也很經濟。」

胡適博士並且在演講方面，對李濟博士提出他的經驗；他說：「講演前飯絕對不能吃得太飽，祇可以吃半飽，能喝點酒更好，吃得飽了，講演時氣力就會不夠。」

博覽與勤讀

第三個故事是關於學問方面的，這故事是李濟博士有一篇文章叫做「跪坐蹲居與箕踞」，他作這篇文章，乃是

因為在安陽出土的一批古代文物中，有一個雕刻，那是一個作跪坐姿態的人像。李濟博士爲了研究這一人像的跪坐，會翻閱了不少書籍，最後，碰巧，胡適博士來到臺灣，他與他談起這個問題。胡適博士當即問他有沒有讀過朱子的文章，在朱子的文章中，有一篇叫做「跪坐拜說」，他要他去查，後來李濟去查了，他覺得這篇文章實在有用，因此他把整個中國的跪坐歷史弄清楚。原來漢朝以前，四川是與中央隔絕的，四川人開始漢化，乃是由於漢朝的文翁入蜀之故，文翁帶了經書到四川，因之四川文風大盛，到了宋朝、四川人爲了感激文翁，翁就刻供文翁的像，這像便是跪坐姿態的。直到朱子著述的時候，仍然存在，李濟博士說，他所研究的這一「跪坐」問題是一個極偏冷的類門，他與胡博士一談起，他就能知道可以在什麼書中去找尋考據，這就是他學問淵博的證明，這學問乃是他自己手不釋卷，一步一步地養成讀書的習慣，而在無數個歲月中堆積起來的。

（轉載五十一年二月廿七日臺北中央日報）

我所親炙的胡適之先生

· 程天放 ·

我第一次看見胡適之先生，是在民國七年五月間。那時我是復旦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一天報上登載杜威博士在江蘇省教育會公開演講，由適之先生翻譯，我和許多同學都去聽。當時適之先生在「新青年」上鼓吹文學革命，批評舊傳統，舊習慣，上海一般知識青年都震於他的大名，却沒有見過他，也沒有看過他的照片。在電車上我們就想像胡適是怎樣一個人物，大家以為他一定西裝筆挺，神氣十足，是一個典型的留學生。等到他陪杜威走上講臺時，穿的是一件長衫，態度謙恭和藹，不像一般留學生，而像中國傳統的學者，大出我們意料之外。這初見的印象深深刻在我腦海中。

我第二次看見適之先生，是在民國九年夏天，我到北京，參加教育部舉辦的各省公費留學生考試。我報考哲學門，由適之先生主持口試。那時應留學考試的人不多，所以他的口試時間了我相當久。那次晤面後，一直到民國十八年，我擔任安徽省教育廳長，有一次到上海，才到適之先生的寓所拜訪，請教他關於教育的見解。此後又一別九年，到民國二十七年八月，我辭去駐德大使職務，經過倫敦返國，那時他恰好在倫敦，我們在大使館同席，而且又住同一家旅館裏，可是我到倫敦第二天，他就去美國，所以談話時間也不多。

三十四年十一月，抗戰勝利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倫敦召集制憲會議，政府派代表團參加。適之先生是首席代表之一，另外三位代表是羅志希、趙元任、李潤章先生。

我和適之先生又同住一個旅館裏，整整四週的時間，我和他朝夕在一起，我對他的思想行為才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同時他對我的了解也可說從那時開始。回國後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我則在南京供職，要等他到南京開會的時候，才有機會見面，可是他的事情忙，訪客多，所以無法深談。三十八年九月，政府派我出席聯合國第四屆大會，那時適之先生正住在紐約。我在紐約三個月的期間，曾到他寓所多次，每次都談一兩小時。當時政府由南京遷廣州，由廣州遷重慶，由重慶遷成都，最後退到臺灣。許多知識分子都向中共靠攏投降，可是適之先生對自由民主的信仰堅定不搖，認為反民主科學反人性的共產黨必然失敗。

在三十九年到四十三年我擔任教育部長期間，適之先生曾返國兩次，每次我都和他暢談反共和改進教育等問題

四十四年春天我應邀到美國講學，在紐約住了一年，常和適之先生見面。四十六年夏天我回國。四十七年四月他也返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這三年多我因為職務比較清閒，所以常到南港去請教。我們所談的包括政治、教育、科學、文藝、歷史、哲學、宗教、美術等，真是上天下地無所不談。適之先生學問的淵博，使得我得了許多益處。我尤其感激的，是在我寫「美國論」時他給我許多鼓勵，並且在臺大醫院養病期間，寫了一篇三千多字的「讀後記」。

我最後一次和適之先生談話，是今年二月十日。我到福州街廿六號去看他，他很愉快地告訴我三天前收到朋友從美國寄來他五十年前登載「留美學生季報」的一篇文章「康南耳君傳」。他立即將它影印，並且贈送我一份那篇傳記有四千多字是用文言寫的。我講「這篇傳真值得珍貴，因為你四十多年來已經不再寫文言文了」。我當時匆匆看了一篇完全是史記漢書列傳的文體。我就對他講：「因為你的國學功夫很深，所以改寫白話文後，非常流麗生動，沒有受過舊文學陶鑄的人，恐怕就寫不出很好的白話文」。他不同意我的見解說：「正因我讀古書太多所以寫出來的白話不够白，不够澈底。」我說不然，任何國家筆下

寫出來的文，總和嘴上講的話多少不同。美國人講話決不會像「紐約時報」的社論，英國人講的話也決不會像「泰晤士報」的專文，所以中國的白話文也不必和口語同樣的白才算好。他聽了大笑。

適之先生對於有中國思想學術的貢獻早有定評，我不必再贊一辭，我只想就我多年親炙，認為最值得欽佩的幾點，介紹給讀者。

第一、一般人往往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新思想新文化是和舊倫理、舊道德不相容的。因此有些人就利用新思想，新文化做護符，來做踰閑蕩檢，腐化墮落的事。適之先生對幾千年來不合理的傳統習慣，予以嚴正的批評，可是他的立身處世，却完全符合中國的倫理道德。他對母親非常孝順，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長作主訂定的，在結婚以前，兩人沒有見過面，可是他對夫人終身敬愛，到老不渝。他對義利之辨非常分別，對不應得錢一介不取。他鼓吹民主自由幾十年如一日，不論環境如何艱難，他決不屈服，決不放棄他的信念，這正是儒家執德弘信道篤的精神。我認為一定要有適之先生這種人格，才够得上批評傳統和提倡新文化。總統魏適之先生聯誼他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真是非常允當。

第二、地位高的人往往有驕矜的態度，盛氣凌人，學問好的人又往往有不近人情的怪脾氣，不容易和別人相處。適之先生是一代大師，名滿天下，但是也非常的溫恭和藹，平易近人。他對政治、社會、教育、文化、各方面重大問題，都有主張，可是他決不抹殺旁人的意見。我和他多次長時間談話中，常常提出和他不相同，甚至相反的意見，他一點不見怪，有時認為我的理由充分，不惜捨己從人。有些寫文章批評他的人，常常用過火的語句，他對我說，「這是圍剿我」但是毫不生氣。他對任何人都很有禮貌，都很親切，有許多青年為他這種誠懇的態度所感動。他的生活很簡單，飲食很隨便，一點沒有怪癖和名士氣；他對僕役也從來不加呵斥。因此，他生前可以和任何階層的人接近，也因此，他死後贏得商人、學生、和他的司機的眼淚。

第三、適之先生除了做過四年的駐美大使外，一生都是從事教育和學術工作，可是他為了對國家民族的前途，不能不談政治，不能不寫有關政治的文章。因為他是個學者，而從政的經驗又太短，所以他的政治主張有時免不了天真，例如四十五年，他向我談起，曾建議總統國民黨可自動分而為二，以實行兩黨政治，我當時就講事實上是

行不通的。毋庸諱言，他對國民黨有不滿意的地方，對政府也有不滿的地方，可是他只是向黨的負責人或政府負責人當面直言，而決不任意公開批評，尤其不肯在外國人面前講本國政治上的缺點，來削弱政府的威信。這和有些自命民主人士比較，專門在美國人面前罵政府，企圖以美國的力量來推翻政府，讓他們掌握政權，人格的高低真是不可以道理計了！近年來凡是想利用他的聲望，來做反政府反國民黨的幌子的，都為他所拒絕。這說明他是國民黨和政府的一個諍友，他的批評完全出於愛國家、愛民族的動機，他個人係毫無政治野心，也係毫無有權位觀念。

像適之先生這樣一個卓越偉大而又富於正義感和愛國心的學者，思想家，假如能够活到八十歲、九十歲，他對於國家民族，對於世界學術，必然有更大的貢獻。不料因為心臟病的關係，使得他不滿七十一歲就離開人世，這實在是中國的大損失，也是整個人類的大損失，一切崇感他懷念他的們都免不了哀痛。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們保持他的精神，追隨他的步履，繼續為民主自由奮鬥，踴躍參加反共抗俄工作，使得暴政早日推翻，大陸早日光復，適之先生死而有知，一定含笑於九泉的。（轉載五十一年二月廿八日臺北中央日報）

深夜懷友

·葉公超·

二〇

我是十五年回國後在北平才認識胡適之先生的。那時徐志摩住在中街，每星期四中午「新月」的朋友們都到志摩家裏去聚餐，適之也常來，志摩常好開玩笑，向適之介紹我說「這是一位 T. S. ELIOT 的信徒。」我馬上就改正志摩：「我不是一個信徒，只是一個 ELIOT 的讀者。」

「適之微笑着說：『佩服，佩服，我聽說 Eliot 的詩只有他自己懂，我還沒有測驗過自己』，據說他是主張用典故的，我是最反對在詩裏引經據典的，希望你把他詩裏的經典加點註疏讓我們了解了解。』率直與幽默是他最可愛的個性。」

他的文學見解與標準和我的根本不甚相同他知道——，我也知道——，有一時期我們常常有所爭論，但是他從不生氣，不譏諷，不流入冷諷熱嘲的意態。他似乎天生的有一個正面的性格。有話要主動的說，當面說，當面爭辯，絕不放暗箭，也不存心計。

從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魯迅領導之下，會向他「圍剿」多次。他也答覆過，有時占點便宜，多半是喫虧，但是他的文字始終是坦率而純樸的。刻薄是與適之的性格距

離最遠的東西。他有一種很自然的醇厚，是朋友中不可多得的。前幾年大陸上在「清算胡適之」的時候，他收集了許多篇文章，拿出來給我看。他說想寫一篇總答覆。我勸他不必。我說一個處女怎好和一羣強盜打交道，況且文字在政治鬭爭中並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他的自話文學運動，他的考據工作，以及他在介紹西洋思想方面的貢獻，將來史家必定有公允的評價。有一點我此時却想提到一下。共匪近十年來已把幾個五四運動變成馬列主義在中國的第一勝利。事實上胡適之在 *Commentary* 大學讀書時期的書信和他在留美學生雜誌上發表的幾篇文章，早已把他回國後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的綱領都已經提出來。陳獨秀等後來利用青年的情緒，來作他們的政治工具當然也是事實。不過，隨着五四運動而產生的自話文學及歷史考證，不能不歸功於胡適之的倡導。現在一般中外歷史家之所謂「文學復興運動」者當然也不能不以胡適之為中心。這運動絕對是含有民族主義的因素的，進步的，革命的，而非馬列主義的。關於這段歷史，已發表的資料

很多，適之日記裏想必還有不少未發表的資料。我很希望將來有人對於這個時期來寫一部比較公正的歷史。

適之是一個有廣泛興趣的人。爲提倡一件事或倡導一種學術的動向，他總喜歡挺身而出，並以全力赴之。他是一個最容易起勁的人。因此不免常常要遭遇到人家的批評，但是從未因而退却。幾十年來的唯一動機，是在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迎頭趕上西洋的進步，而且無時無處不反映着他的愛國熱忱。我知道他從沒有在外國做寓公的思想或計劃。有一天他和我在紐約向席，主人是一位美國知名的學者，席間有一位久居國外而早已不打算回國的教授，適之在席上用中國話對那位教授說：「我勸你還是回臺灣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一年半載。你要曉得，一個沒有國籍的人是最痛苦的。」其實這位教授也不會聽他的話。不過適之的那副誠懇表情和沉重的語調，我至今還記得。

他的朋友們都曉得他是最樂於助人的一個人。只要他能做到的他沒有不幫助朋友的。往往爲了幫助朋友累了自己。記得他第一次在美國得了心臟病，正在醫院療養期間，忽然一定要起床寫信，醫生不許他動，他却不顧，因爲看了他的日記，他發現他在病前會答應一位素不相識的學生到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去替他借一本中文善本書（普通

人大概借不出來吧）。近十幾年來，他屢次想繼續寫完他的哲學史都未能達成他的心願，其中固有別的因素，但主要的也就是因爲太熱心替人家或公家做事。

適之是天性樂觀的人，容易被人家的新計劃新觀念打動，也容易滿腔的熱忱頓時就消沉下去。但是他不會因而改變他的樂觀態度，希望是他的動力。因此，他的康健也受到這種「勤」的性情的影響。這也正是他可愛可敬的地方。我常說文明的人類可分爲笑與不笑的兩種，適之無疑的是屬於常笑的。我很少見過他長期的發愁，笑的曙光總是從一片烏雲裏再透射過來，使希望又變成他生命的泉源，恢復他那青年的精神。丁在君先生死了，他很難過。我去看他，他呆坐在那裏。我問他：「究竟怎樣死的？」他馬上把當時所獲得的幾種消息來分析，好像做一篇考證一樣，客觀的研究了半天。最後，他很冷靜幽默的說：「在君一定會說，你又在做考據了。」說完，不覺自己微笑起來。昨晚聽見他過世的消息，我也難過了一陣，此刻却並無哀痛的情緒，更並不想寫什麼哀悼的文字，也寫不出來。

適之逝世不及廿四小時，自由中國已感覺缺少了一個不該離開的人。我相信這種感覺必然會加深，而同此感覺者亦必一天比一天多。（五十一年二月廿五日夜，石牌）

敬悼胡適之先生

· 李 璜 ·

昨日（二十四）上午，剛剛接到臺灣省友人轉來胡適之先生讀了我最近一篇文章而特別向我致意的信，當夜廣播，他便以心臟病忽然去世了，案頭紙墨猶新，而斯人已逝，東望臺北，不禁愴然！

古人說：「蓋棺然後論定」。胡先生則四十年來，對中國學術思想上的貢獻，已是不待蓋棺，而早應有定論的。——他是自「五四」以來，在中國的啓蒙運動中，最能將科學的懷疑思想與求證精神普及於中國知識界的一位學者。

胡先生主張：「盲目跟着孔夫子走的不是好漢；盲目跟着朱夫子走的不是好漢；盲目跟着馬克斯走的更不是好漢。一切要證據，用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科學方法，去打倒一切教條主義」。——這個主張，他從民國八年起，一直到四十八年，還在不斷的強調；這在過去四十餘年間，對於中國學術思想以及政治鬥爭上的影響却是非常之大的，雖然這主張不為左傾與右傾的專斷的教條主義所喜，而且曾被清算過，然而今後的中國的科學與民主如有前途，則胡先生的啓蒙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胡先生在科學的思想與方法方面，能够從事於「普及」，在這點上，其貢獻尤其甚大：第一是他的白話文運動，第二是他的水滸傳與紅樓夢等等考證。

白話文對於科學思想普及之功，不待深說，盡人皆知。只舉一件事：如果沒有白話文的提倡與應用，這三十多年來，我們教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教員，便沒法去使學生言下領悟，書看得懂。試去一讀徐光啓與利瑪竇合譯的自然科學的書，以至嚴復譯的社會科學的書，就知道，那種古文，非三十年來一般學生，甚至一般教員所能明確的了解的。徐、利、嚴復的文章非不佳，所譯的內容也並沒有錯，然而這三十年來，能够望文識義，透澈了解者又有幾人？無他，學校的時間表與學人的注意力，却不能再容許去咬文嚼字先費十年功夫了！

近來有些人，認為胡先生的成績，無非是考證了幾部通俗小說，如水滸傳、紅樓夢之類，不算得甚麼學術貢獻。但